

親愛精誠的政大

杜涓海

每個大學都有獨特的精神，這種獨特的精神影響校園的風氣和因應行爲。政治大學的獨特精神就是「校訓」。

民國十六年八月十二日的上午，校長 蔣公決定以「親愛精誠」四字做爲「中央黨務學校」的校訓，那天下午就宣佈辭職下野。當時正值北伐期間，國家仍是分崩離析的局面。「親愛精誠」就是在那種環境下生根的。

黨校之成立是爲了培養健全的革命幹部，以完成北伐。復成橋畔的「一二二」慘案，是黨校師生第一次直接擔負起革命幹部的使命，也是一次有信仰，有組織的行動。「擇善固執，貫徹始終」的精誠，就在那時成爲這個學校的一貫精神。

北伐完成後，爲了配合訓政時期的需要，於是將黨校改爲「中央政治學校」，以培養國家政治建設的人才。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國內要求抗日的熱潮風起雲

湧，當時政校學生一致響應羅家倫先生——「以革新政治爲雪恥圖強的基礎」的號召，堅決擁護政府「攘外必先安內」的決策，就如同戴季陶先生對全校師生所提出的要求：「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團結不固。」全校師生在「信仰」與「團結」的氣氛下，所顯現出來的校風，在那個時期就與其他學校大爲不同。

抗戰勝利後，爲了配合憲政的實施，政校改爲「國立政治大學」，以培養社會及人文科學的學術人才爲主。民國三十八年，在國勢最危殆的時期，政大始終追隨政府遷移。山西大邑之戰，政大學生三百多人傷亡近半。當時軍校校長張耀明將軍曾贊歎說：「以一批文學校的大學生，能够見危授命，視死如歸，以生命行動來表現他們的忠勇志節，這不能不說是特識卓行，代表了中華民族的正氣。」那段時期，這所「文學校」的大學生所表現出的貫徹始終、堅貞不移的精神，不僅取得了在臺首先復校的機會，也使得「親愛精誠」的精神能一直脈延到木柵的指南山下。

民國六十年四月中旬，釣魚台事件發生，政大學生在校內舉行一次「和平的、冷靜的」遊行。而各系

級代表三百餘人「有組織、有秩序」的遊行到美國大使館呈遞抗議書。同年十二月下旬，由研究部學生發起爲期一週的「中央級民意代表改選座談會」，坦誠而理智的討論選舉問題。這兩次活動都是學生自動自發的愛國舉動，積極、冷靜地表現出青年對國事的關懷。

這幾年來，學生社團的蓬勃發展，意見交流的廣泛增加，審稿制度的設立，咖啡座談的舉行等等措施，已逐漸形成政大一些新的精神面貌。在始終保有的「大家庭」氣氛下，所表現出來的「親愛精誠」，在信念上仍然充滿着對政府的信任和對國家的信心，在言論上則更趨向自由而開放，但在行動上却更爲審慎、熱誠而團結。

在時空不斷的變革下，「親愛精誠」的校訓仍然不斷在影響這個學校的校風，也不斷在塑造這個學校的風格。

從民國三十八年，中央政治學校改制爲國立政治大學迄今，政大在教育行政和學生活動方面有幾種顯著的事例值得重視。

在臺復校後，因爲學生人數激增，而且教育以培

養行政通才與學術專才為宗旨，原有的訓導管理方式乃改成輔導部門。復校二十餘年來，更注重學術研究，研究所的數目一直增加。到目前，政大的學術研究與國內各大學院校沒有多大差異，而且更有成就。

隨着時代教育的潮流，政大也特別注重推廣教育。民國五十二年，政大和美國密西根大學合作，創辦公共行政及企業管理教育中心。先後舉辦一百多次在職訓練，幫助公私企業主管人員的工作觀念和技術。在諮詢服務工作方面，政大各院系經常接受政府或企業機構委託，作專題服務性研究。

就時代的演進而言，近代各國大學教育發展的趨勢，其中重要的一項是學術研究的擴大和加強。政大改制以後，一向是以研究社會人文科學為主要目標，而社會資料中心的設置，實在奠定了政大社會人文科學研究的基礎。社會資料中心的任務，不僅消極蒐集與整理資料，更配合有關的研究計劃，利用所有的資料，積極從事社會科學研究工作的發展。就目前而言，社會資料中心已經具有相當的規模，不僅被視為政大員生的精神食糧寶庫，而且還時常為國內外人士提供服務，因而完成不少專門性學術研究。

去年，中正圖書館正式啓用以後，政大學生有了更具體而明顯的學問中心，使知識的求取，智慧的發展有了更便捷的途徑。

一個優良的讀書環境，有助於研究風氣的滋長。同樣的，一些壯大的學生運動，也有助於傳統精神的發展。下邊是對政大學生活動的簡述。

民國六十年四月十二日，天還沒亮，大部份的人還在睡覺，校區內的海報貼出來，全是有力的聲音：

「誓死保衛釣魚台」

「我們的領土不許他人強佔，我們的主權不容他人侵犯」

「絕不容許雅爾達密約的重演」

「日本無權佔我領土，美國無權重寫我歷史」

「打倒日本軍閥主義」

「打倒美國強權政治」

「我們抓起筆就拼命寫。」當時參與其事的陳博明說。想到多難的祖國，想到「盟邦」的背信忘義，有一批青年學生儘管自知「還不了解國際政治的實際狀態」，但卻決心要挺身出來「為政府打氣」。他們堅定了「為政府後盾」的立場，表明了「關懷國運，

支持政府」的態度，而展開了行動。

這是在美國宣佈準備於一九七二年將釣魚台隨着琉球一併送交日本後的第四天。

四月十四日，代聯會舉行全校座談會，四維堂前寫着：「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中午十二點半，四維堂樓上、樓下都擠滿了人，出席師長和同學有一千多人。據一位當時四年級的同學說，這是在政大看到最大的一次座談會。

座談會採自由發言的方式，同學們都踴躍爭取發言，會中且宣讀「致全國青年同胞書」、「致留美學界書」、「致日本大使館抗議書」、「致美國大使館抗議書」。其中說到「我所生於此憂患之季，正是為國家，為民族獻身奮鬥的好時機……」時，宣讀的同學不禁淌下熱淚。

散會後，同學的不顧校方的阻止，決定要在校內舉行一次「和平的、冷靜的、理智的」遊行。五、六百名同學由國旗和標語前導，在校園中繞一圈歷時約一個半鐘頭。在果夫樓前，全體同學齊唱國歌、高呼口號。

四月十五日上午，本校僑生與臺大、師大僑生聯合，約一千人在北門公園集合後齊往美國大使館靜坐示威，並遞抗議書。

當天在校的臺生也積極的與學校協商；代聯會和學校在上午十時和下午七時各舉行了一次會議，一直到晚上十一點多才有意義。決定第二天的遊行定得很謹慎有組織、有秩序的進行。

於是同學們漏夜討論次日遊行的細節、做標語、做海報、做臂章。有的同學中途退出這項行動，但也有同學自動送來床單，充當臂章的材料，加入工作。

十六日上午，本校各系級代表三百餘人赴實踐堂，由張寶樹秘書長接見，陳裕清先生和錢復先生報告釣魚台的歷史和地理狀況，及政府對本案的處理經過。有關當局極力勸告同學們不要遊行，會議由上午十時延續到下午二時，同學們仍然堅持要遊行到美使館，但代表們表決結果以十票之差，取消去日本大使館的計劃。

同學們由實踐堂出發，經中華路遊行至美國大使館。代表們獲得美大使馬康衛的保證，答應要把抗議書轉交美國政府後，才乘車返回政大。這份抗議書中

，鄭重表明美國發表的釣魚台列島歸屬聲明已嚴重侵害我們領土主權，希望美政府懸崖勒馬，否則由此所生一切嚴重後果，將由美國負全部責任。

在這些衛國者悲憤的行動後，政大研究部和大學部的學生展開了一次理性的結合。

民國六十年秋天，卜少夫從香港寄了一篇特稿刊在臺灣的報紙上，主張臺灣的中央級民意代表應該全部改選。沒想到這篇文章在臺灣引起軒然大波。當時政大的學生，尤其研究部學生，曾舉行了一次很有紀念意義的座談會，討論這個問題。

「中央級民意代表改選座談會」是本校研究部學生幹事會主辦，民國六十年十二月八日晚上七點在六三〇教室舉行，由當時研究生幹事會總幹事蔡紹南主持。

民國五十八年，政府曾依憲法規定的人口比例標準，舉辦過一次臺灣區中央級民意代表增選，跟民國三十七年一樣，是久任制。而這次座談會中的主要爭論是中央級民意代表應該全部改選，或部分增選和補選這個問題，更有某些同學，提出設定臨時國會和仿英國議會改制成上下院的建議。會中全由學生發言，雖然

研究生發言佔大多數，但大學部的同學亦不乏其人。

同一個星期的禮拜六晚上，在學生活動中心的禮堂又舉行了另外一次座談會。也是由研究生幹事會主辦，邀請了監察委員余俊賢、立法委員鄧祥禹等人出席，發表對於中央級民意代表改選的看法，學生再針對他們的發言表示意見。

會後，研究生幹事會將座談會中同學的意見整理出來，反映給中央當局，同時轉發給中央通訊社，希望促成中央級民意代表的改善而臻於更充實。

做為一個大學生，除了透過正式的授課學習各種知識技能，也應該以自動自治的方式進行自我訓練。政大有蓬勃的社團活動，學生們透過社團活動學習民主與服務的生活。

政大第一度的社團負責人研習會，是在民國五十五年舉行，然後在六十一年、六十四年三月和六十四年九月又分別舉辦了三次。

前兩次的社研會，是由課外指導組主辦，主要在加強校內社團負責人對國際局勢的認識、增進社團負責人員的領導能力。當時雖亦有同學擔任服務和輔導，但整個籌備及推動，實際上是由學校訓導處負責。

在課程方面，多是灌輸式的講授以及聯誼活動，會程只有一天的時間。

到民國六十四年三月，本校學生代聯會主動提出社團負責人研習會的構想，經過訓導處課外活動指導組的全力支持，舉辦第三度社團負責人研習會，才步入了一个新階段：這一次，學校只採積極協助，而由同學自動參與籌辦整個活動。

這一次社研會的課程，除了演講以外，增加了座談時間，並且把研習期間增加到一天半，地點也從校內移向校外。

「研習社團的理論、溝通思想、交換經營的經驗」是社研會的主要目的。到了六十四年九月第四度社團負責人研習會，更是朝着這個目標邁進一大步。這時着重於社團負責人氣質的培養，因此，有濃厚研習氣氛的社研會，取代了原來娛樂成分多於學術味道的聯誼性社研會。課程也更充實，除演講、座談之外，更有實際演練、分站教育等。到第四次社研會，社團負責人研習會已經發展到「穩定階段」。

本校目前已經有九十九個學生社團。但是並不是每個社團負責人接任之初都能了解到社團的本質。而

社團的經營與發展，需要切合實際環境的變動。在這逐漸轉變的趨勢中，身為領導者，各社團負責人，必須具有新的觀念、新的技能。所以，社研會應運而生。經過幾次社研會後，校內社團受到相當的刺激，一度呈現出蓬勃發展的現象。

此外，更令人興奮的是，最近幾次的社研會，都是由同學自辦，這充分表現出學生自治的能力。只要學生覺得需要，學生可以自我教育。

「親愛精誠」精神，需要全校師生基於互信互諒互動的原則來發揮。在政大，有一種學校主動定期和學生交換意見的「咖啡座談會」。「咖啡座談」的誕生，主要是由於兩個期望：期望學校的行政首長和學生之間沒有溝和疏離存在，也期望學校的社團能因不斷的批評和反省而成長。

所以會有這兩個期望，還是在兩次較為特殊的座談會上反應出來的。民國六十四年一月。在一羣關心校政的同學要求之下，「學生代聯會」舉辦了一次校政座談會，出席的師長有校長、教務長、訓導長、總務長、總教官、課外指導組主任和生活管理組主任等；與會同學反應出對一些校政措施的不滿和誤解，也

顯現出學校當局和學生在觀念溝通和校政傳播方面的缺失。同年十一月，「政大青年社」在新聞館舉辦的校園風氣座談會上，與會的師長和同學更積極的認為學校應具備良好的溝通制度和完全參與的環境，以促進社團的發展。也就因為如此，「咖啡座談」召開的最基本目的就是在：促進師生之間的意見交流、鼓勵學校社團的蓬勃發展。

這項由校方主動安排的溝通制度，希望的是：能在輕鬆、坦誠的氣氛之下，討論有關學校和學生所面臨的問題，方式是不拘形式的，態度却是嚴謹理智的；座談會裏的言論和意見，對外是不負言責的。到目前為止，座談的話題仍是以社團工作為主。從這學期開始，座談已經開放讓同學自由登記參加，希望能由大而小，由團體而個人，對學生所面臨的問題，做更為廣泛的接觸和瞭解；但是效果並不很好，大部份的同學並未爭取這項權利。

溝通，是民主教育中極重要的一環。政大的學生刊物常常發生稿件問題。民國六十一年六月，代聯會要出自強「革新號」。稿件收齊、編好了，預定六月十二號禮拜出刊。

但却因審稿問題一波三折，造成代聯會與學校當局之爭執，形成代聯會之總辭職而未允的局面。

民國六十三年五月十五日，本校終於成立了一個「學生社團刊物文稿評審委員會」，由訓導長、各院代表教授、訓導處有關輔導人員和社團工作同學以及稿件作者本人所組成，召開圓桌會議公開評審。會談氣氛融洽，一切留待評審的稿件都由會議決定之。這個制度目的只施行於「政大青年」稿件的審核。但我們希望這個制度有一天能擴及到其他全校性的刊物。

民國六十二年元月，政大「文藝研究社」爲了籌劃幹部訓練營和交換社團工作經驗，邀請了臺大、政大幾個主要社團的負責人，在政大新聞館舉行座談。這次是難得一見的「兩校座談會」。雖然那是私下的校際聚會，却產生令人意外的結果。出席那次座談的政大同學都有相同的感覺：由於政大僻處一隅，造成學生在社團事務上意志的單薄。那次座談，最令政大同學震撼的是以理想主義者自居的「臺大青年社」，他們以兼負「廚師」與「醫師」之責自許。出席那次座談的政大同學，一方面受到臺大學生那股豪情的刺激，一方面也因為整學期政大出不了本校刊而感到

難堪。

校際間的學生交流，顯然很有必要由教育當局鼓勵的活動。經由校際間的互動，學生的精神和活動領域得以拓展，可惜，到目前為止，政大學生並沒有出現積極的行動來促成校際交流的實現。

儘管如此，近年來，政大學生還是逐漸把脚步伸展到校園以外的領域。各種服務性社團很積極熱心地展開愛盲、暖冬、山地服務、社區服務等等活動。參加服務的學生人數逐年增加，這或許是「親愛精誠」以一種新方式展現的起步。事實上，我們很容易發現，這一代的大學生已經逐漸關心社會問題，譬如北海油污發生的時候，政大青年社就曾出動一批學生實際去瞭解當地的災情，並且予災民以同情而忠實的報導。更值得令人興奮的是，從這次五項公職人員選舉的過程中，發現政大的學生對政治的興趣和關心的程度愈來愈高。他們不肯停滯在靜態領域裏去的求知，更要透過實際的參與來學習管理家人的事務。這不能不說是對親愛精誠精神的一種更真實的體現，這種真實的體現將會使政大學生更為成熟，更具能力，且負起更多對社會國家的責任。

